

卷款近亿元股长留下书信详述作案手段

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利用职务之便,与当地信用社主任勾结,采取私刻公章等手段,从财政专项账户上套取资金近亿元后出逃。

李华波一家4口在消失前,曾告诉邻居说要到海南岛去过年。李华波还向一些朋友借了巨额债务。李华波走之前,还特意向局领导请了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李华波为出逃在提前做准备。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财政股股长,连续多年伙同他人从财政专项账户上套取资金9400万元,其间竟无人察觉,在安全抽身出逃后还主动打电话给单位领导泄露“机密”。

2月11日中午,身为经济建设股分管领导的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程四喜接到了李华波打来的电话:我已经逃到了加拿大,这几年,我贪污了很多公款。

闻此,程四喜脑袋顿时一片空白,待情绪稍稳后,他马上拨通了县财政局局长张庆华的电话。财政局领导紧急碰头后,于下午5时左右立即向鄱阳县公安局报案。

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自此揭开。

一封书信

由于案情重大,鄱阳县公安局立即向县委、县政府紧急汇报。县委常委办公室、县长办公室在第一时间召开,迅速成立了由县长担任组长,相关县领导任副组长的案件侦破领导小组,下设案件侦办、新闻发布、审计整改等五个工作组,抽调县纪委、检察院、公安局、审计局、司法局等单位40余名骨干力量组成“2·11”专案组。

记者获悉,江西省检察院和江西省公安厅也派员进驻鄱阳进行指导协助案件办理。鄱阳县政府的通报中提到,李华波在逃离前,还留下了一封书信,详细讲述了这些年伙同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等官员,用假公章从国家专项账户中套取资金的作案手段。

正是以这封书信为线索,专案组在2月11日当天,成功控制了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和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副股长张庆华。

部分嫌疑人被抓

鄱阳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隶属上饶市,全县人口150多万。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只有4.1亿元,属于典型的财政穷县,现在县里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每月只有千把块钱。就是这样的一个贫困县,竟发生了套取9400万元财政专户资金的大案。这在当地自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2月21日,鄱阳县“2·11”专案组发布的消息称,李华波等人的部分犯罪事实初步查清,关键证据确凿,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涉案账号已被冻结。截至2月20日,江西已经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被转移套取资金中的4605万元的去向已查明,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专案组目前已锁定李华波的具体位置,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

经查,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与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等人,利用职

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的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账户上。

江西省上饶市纪委新闻发言人2月20日对外透露,上饶市纪委2月19日已决定对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长张庆华启动问责程序,展开问责调查,同时就外界质疑的问题一并进行核实。

负有领导责任的欧阳长青和分管领导程四喜,已被鄱阳县委于2月18日分别作出建议按照程序,免去县财政局局长职务和县财政局党组书记职务的决定。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月21日也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失职责任和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相关人员给予相应处理,并对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原主要领导和相关管理责任人展开调查,启动问责程序。

澳门赌场常客

距离鄱阳县委、县政府大概有四五公里远的鄱阳县财政局,大门口镶嵌着“心系群众,为民理财”的大幅标语。

鄱阳县财政局设有18个股室,有干部职工400多人,下辖5个二级单位,29个乡镇财政所,1个契税所,在2005年、2007年、2009年曾连续三届被授予江西省文明单位。

李华波和张庆华所在的经济建设股共4人,除了他们两个股长,还有两名会计。经济建设股具体管理基本建设资金以及家电下乡和国土局、交通局等几个单位的人员工资。李华波负责综合管理和预算管理,而张庆华则负责专户管理。

在经济建设股的办公室,当记者问起李华波和张庆华的事时,办公室一位年轻人不停地摆手,对记者说,他是刚来的,啥都不知道。七楼会议室,两人向记者的意图后,便让记者去找县委宣传部。

采访中,一些知情人对记者说,李华波这个人很有缘,城府很深。今年春节前夕,李华波以80万元的价格把他在县城的一处独栋户的楼房悄然转手,家里的亲友都不知情。

李华波一家4口在消失前,曾告诉邻居说要到海南岛去过年。李华波还向一些朋友借了巨额债务。李华波走之前,还特意向局领导请了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李华波为出逃在提前做准备。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现在已经分管经济建设股的局领导徐晓明说,李华波和张庆华二人大概都50来岁,张庆华干了好多年的副股长,李华波2006年当的股长,之前在预算股当了多年的副股长。

徐晓明说,因为以前不分管经济建设股,对他们不是太熟悉。但听说李华波平时人缘比较好,业务能力也比较强,还听说李华波比较好赌,但跟局机关的人很少玩。

一位自称熟悉李华波的人告诉记者:“听说他家那栋三层楼高的独栋院就是用以前赌博赢的钱建的。”李华波在他留下的那封书信中,公开承认了他喜欢赌博这一点。

记者了解到,那封书信只有一页纸,除讲了



他如何套取公款的事,还讲了自己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义的人,他对不起局领导,对不起组织;信中还提到,这个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都是他一人所为;他还特意提到,自己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都是因为他深陷赌博,到澳门越赌越深,难以自拔。

外号“徐色狼”

通过专案组查证,早在2006年2月,李华波就和徐德堂一起从县财政局专项资金中,陆续套取巨额资金后到澳门赌博。目前,外界尚不清楚李华波到澳门参赌的具体金额。

当时的分管局领导程四喜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听说过李华波到澳门赌博的事,但没想到他会套取财政局的专项资金去赌博。

同财政局的人一样,徐德堂所在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的人对此事也很忌讳。分社二楼徐德堂的办公室大门紧闭,“主任室”的标牌依然在;挂有“副主任”标牌的几个房间也锁着门。一间大房子里有3名工作人员正在一起说话,见记者进屋,马上走开。

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胡主任去年12月到任。他告诉记者,他本人对徐德堂了解不太深,听说这个人很聪明,协调能力强,沟通能力也不错。

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向记者道出了他们所知道的徐德堂的另一面。

据介绍,徐德堂在鄱阳县社会关系非常广泛又复杂,他一直跟社会上的一些三不四的人交往比较多,在县里影响也不好。

徐德堂很好色,有权有势,有过十几个情妇。在当地,老百姓都在背后叫他“徐色狼”。第一任老婆因为知道徐德堂在外面有女人,才跟他离了婚。离婚后,徐德堂给了她100万元。

徐德堂对他的情妇很舍得花钱。曾给他的一个情妇买了辆20多万元的马自达轿车;他还投资给一个情妇开了一家床上用品专卖店。有人指着不远处的一家门店对记者说:“就是那家。”

徐德堂给当地老百姓的印象是比较高调、张扬。徐德堂原来有辆本田轿车,后来又买了一辆奥迪车。对于徐德堂的这辆奥迪轿车,大家都比

较熟悉,就连车子的牌照号码,都能随口说出。

作为一个小小的信用社的主任,怎么开得起奥迪私家车,还养那么多情妇,钱从哪里来的?自然引起周围人的议论。

据了解,徐德堂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搞”钱——贷款利息好处费;将朋友们的钱高利贷给房地产开发公司牟利,利息高达5分到1角。

徐德堂小学文化,此前在农村开拖拉机,其父曾在信用社工作,退休后,徐德堂便闯进了信用社。

徐德堂早先在乡里信用社上班时,就开始了其“资本运作”——先是贷款10万元给即将倒闭的乡农技站,然后跟农技站的部分人合伙将这笔钱瓜分,账则挂在农技站,又以农技站的破房子抵了贷款。

作案手段低劣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向记者介绍说,关于财政账户资金的划拨管理流程是,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

鄱阳县财政局这种每划拨一笔钱都要经过多个环节、多人经手的流程设计,自然使一般人难以作案。

李华波在办理财政局的正常业务的时候,会按正常程序走;套取资金时就省去前面几个环节,而直接走后面的“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两个他可以操控的环节。

第一步,李华波私刻了一枚名称为“鄱阳县基础设施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的公章,这枚公章的名称与鄱阳县财政局在鄱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分社的预留印鉴“鄱阳县基础设施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一样。

经手责任人的私章是李华波的,按照财政局的相关规定平时就放在李华波处,由李华波本人保管。

第二步,有了假公章和真私章,李华波只要能拿到支票就可以。保管支票的是副股长张庆华,而张庆华正是他的团伙成员。这样,李华波很轻而易举地就能拿到支票,并盖上自己私刻的假公章和自己保管的真私章。这些就绪,便送到城区分社。

记者了解到,城区分社关于客户存款、取款也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显然,在李华波等人作案过程中,如果没有城区分社“内鬼”的配合,一笔钱也划不出去,因为支票上加盖的是假公章。

而这枚假公章的图案与财政局预留的印鉴图案有明显的不同。记者对比盖在有关资料上的这两枚印章的图案,很容易就能发现,图案中间五星

到下方“管理专用章”的距离明显不同,假的比真的距离近;而且字迹的粗细、大小也有所不同。

相关人员都命于当了十多年主任的徐德堂。这样,便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例如,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盖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被派到城区分社的委派会计潘学迅和城区分社的综合柜员朱小兰,却没有履行职责,严格把关。

据记者了解,2009年11月,李华波去城区分社更换印鉴,按规定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他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到城区分社更换了印鉴。

原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他解释是“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李华波、徐德堂等人的作案手法极其低劣、漏洞百出。

他们要从鄱阳县财政专户上划拨款项,需要填写支票,而有的支票上面的问题十分明显。如,在一张转账支票上,记者就看到,除了“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的公章是假的,关于转账的金额部分——小写的地方显示出来的金额是1360万元,而大写的地方填写的却是“壹仟叁佰陆拾元整”。

就是这样的一张支票,城区分社竟也从财政专户上划走了1360万元,给收款人“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同样,他们从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账户上往外套现填写支票时,一张转账支票上,收款人的地方填写的是“付文元”,而在支票时提供的身份证上面的姓名竟是“付元文”。这样的支票,城区分社的工作人员也给转账了。

类似明显的问题还有不少。同一个客户,在存款凭条上“客户签名”处的签名字迹不同;再如,钱先从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账户上划进个人账户,而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出具的转账支票上填写的日期却是此后的日期。

审计期间继续作案

记者还了解到,李华波、徐德堂等一伙人作起案来还分不分时候,肆无忌惮。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向记者透露,在2007年7月至9月,国家审计署武汉特派办到鄱阳县对中央转移支付支农专项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李华波、徐德堂等一伙人也没有停止从鄱阳县财政专户上套取资金。3个月里,他们作案3起,划走了五六百万元。

李华波等一伙人从2006年就开始套取专项资金,为何总能逃避监管而不被发现?

鄱阳县财政局领导的解释是,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财政局的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全国的财政部门跟银行间都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的领导则回应是“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一起作案,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发现账面被做了手脚。据《法治周末》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77 E-mail: cpyy@163.com

让新生代农民工走进“春天”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了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这是近年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关于“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的较完整的一份调查。它让那些“漂着”的面孔逐渐清晰,让更多人看到了“春天”与这些身处社会最基层人群的距离,也让人感受到了中央与相关部门推动这一群体走向“春天”的决心。

1.5亿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作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城市居民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关注、了解他们?如果不是一年一度的“讨薪潮”、“用工荒”,他们几乎很难进入大众媒体的视野。

今天,当他们通过这份调查报告,整体地站立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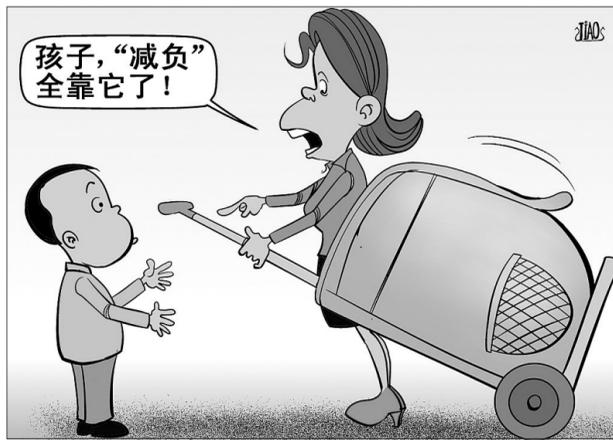
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农民工抑制不住的发展冲动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的时间长,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找自我发展机会;他们劳动合同签订率有所增长,维权意识更强;他们频繁跳槽,希望融入城市和社会,渴望认同,追求梦想。

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农民工仍显尴尬的身份处境和需要重视的生存状况。与父辈一样,他们至今依旧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合同不规范、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等处境。大多数人的职业命运,依然是高强度的低端产业岗位上卖苦力。

过去30年中,农民工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去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传递出中央对这一群体的高度关注。然而,作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阶段性矛盾,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善,是一个艰巨、长期的工程,不仅需要制度关怀,还需要从政府、社会、市民层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进行全方位调适。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缺少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缺少融入城市的能力,是他们面临的现实。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与社会,追求幸福生活——这是我们从这份调查报告读到的责任,也是各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

过去一年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曾以各种方式,比如“旭日阳刚”、“唱《春天里》,向这个社会宣告他们的存在。今天,又一年春天来临之际,希望这份沉甸甸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成为一个推力,推动政府进一步研究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他们早日走进“春天里”。 郝洪



减负良方

随着寒假的结束,江西德兴市中小学陆续开学上课,由于书包太重,一些小学生在课堂上用了拖式拉杆书包开始新学期的学习。他们或一人拖着一个书包走着,或两人一起拖着书包去上学,拖着书包与地面摩擦发出“嗒嗒”声,成了孩子们上学的一道风景线。一名在该小学读四年级的小姑娘告诉记者,书包里装了十几本教科书,加上学习辅助书、作业本、文具盒、字典等,“背起来太重了,这样拉着更加省力。” 焦海洋/图

这班列车,是开往天堂吗?

女儿让我检查她的作业,是一本某位“名师”主编的现代文课外阅读集。在这本提供给孩子们的作为作业的书里,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天堂的最后一班列车》。大意是说在美国的“幸福街”上,有两个孤儿在冻饿中卖报为生,在他们为圣诞老人的企盼中,圣诞老人来了,“带着他们追赶通往天堂的最后一班列车”,在那里他们终于享受到了幸福……

看完文章,本已让人心生“今夕何夕”之感,更要命的是,文后让孩子们选择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多选还是单选。女儿的选择很坚定:C和D,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孤儿永远不会找到幸福,等待他们的将是死路一条”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的悬殊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这是一个能够得分的选择,但我还是跟女儿说,其实我更想选“B”:只有努力卖报、努力工作,赚钱就多,幸福就来得快。女儿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却在我心里激起波澜:你选“B”不会得分。

这篇文章“纯属虚构”,但凡有着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非如此不堪,人与人之间也没到“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地步。它让我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其实,不管是这开往天堂的最后一班列车,还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都应该超越国别、超越政治的高度,从人性中最为温暖宝贵的同情、守望相助来予以解读。遗憾的是,本应普照世界的人性之光,被人为了遮挡住了,并按照一厢情愿式的理解或者说需要来切割、分化、扭曲。

这种完全背离了基本事实的捏造与拙劣的煽情,曾经在政治主导一切的年代里盛行,但我没想到,在2011年初春一个晴朗的上午,我竟然“意外”发现它的死灰复燃。除了意外,我更愤怒于这本书的编者向我女儿灌输的自以为正确的价值判断。当女儿挑出那个标准答案时,我知道她不是在享受学习,而是在遭受伤害。尤其当地小小学年已然明了哪个回答能“得分”哪个回答“不得分”时,我更觉出深深的悲哀。

中国人向来以“为孩子好”的苦心而著称于世。但这辆开往天堂的最后一班列车却提醒我们,是时候思考一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孩子好”了。就像前几天,我所在的那座城市因为有家要举办“接吻大赛”而引起一场风波,有人街头抵制。其实,办比赛也好,抵制也好,只要不违反法律,都有表达的权利。但让我警觉的是,抵制者所称的理由中不乏“不如动物”的词汇,更将“污染孩子”当作了一面大旗。在我看来,这种看似高洁的“道德洁癖”和思考问题的一元方式,比接吻大赛更对孩子不利。在这个多元的世界里,更紧迫的是教给孩子们如何尊重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与理念,教给他们如何认识到要用多元、发散的思维来面对这份扰人的问题,如何在这纷扰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这班列车驶向了哪里?这就看每个人的解读了。如果我们从死的痛苦中读出生的力量,读出怜悯和救赎,读出渴望,从而在心底多些柔软,在以后的日子里带一束光与热给世上,那这班列车当然驶向了天堂。如若不然,那我们就该问一句:这班列车,把人心,尤其是孩子们的心,带往何方? 李家伟

莫让公车有偿私用架空公车改革

广州市委副书记苏志佳2月22日在参加“两会”讨论时,主动谈起广州公车监管措施。未来,广州市公车将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实行分级管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措施,试点单位估算,拟按照每公里1.5-1.7元收费。(《广州日报》2月23日)

公车有偿私用并不是我们的独创,有些国家就采用这种举措对公车私用进行规范。譬如德国政府部门对公车私用设有明确的收费规定:在柏林,所有公车私用都收费,包括汽油费、维护费、停车费和磨损费等。在芬兰,公务车只能在执行公务时使用,正常上下班和个人私事不得使用公务车。如果情况特殊,必须使用公务车上下班,需要照单纳税。

从制度来说,广州市的“公车私用收费管理”明显借鉴了国外制度的设计思路,“收费不是随便便象征性收费,而是要把公车使用产生的汽油费、管理费、折旧费、保险费等等统统算进去,费用由财政局收取,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取费用将作为公车折旧等补偿。”但切入现实的语境,我们却明白,与国外相比,我们的很多制度本身并无太大的缺陷,只是执行起来很难不折不扣地落实——根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

公车有偿私用后,公车私用和公用的性质如何区别,如何计费 and 收费,怎么避免暗箱操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尽管广州市已经投入巨资对全市公车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但公车私用现象会逐步消除。而公车有偿私用,则是无形的公车特权购买,这个口子一开,会让公车私用“合法化”,从而架空了正在铺开还未取得成效的公车改革。

公车有偿私用后,公车私用和公用的性质如何区别,如何计费 and 收费,怎么避免暗箱操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尽管广州市已经投入巨资对全市公车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但公车私用现象会逐步消除。而公车有偿私用,则是无形的公车特权购买,这个口子一开,会让公车私用“合法化”,从而架空了正在铺开还未取得成效的公车改革。

公车有偿私用后,公车私用和公用的性质如何区别,如何计费 and 收费,怎么避免暗箱操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尽管广州市已经投入巨资对全市公车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但公车私用现象会逐步消除。而公车有偿私用,则是无形的公车特权购买,这个口子一开,会让公车私用“合法化”,从而架空了正在铺开还未取得成效的公车改革。